

特載：論中共一九八五年政策取向

曹伯一

〔本文為作者向「第十二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三月廿五至廿八日在東京舉行）所提論文，特予選載，藉供參考——編者。〕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掌握了政治權力，鄧小平體會到要收拾三十餘年共黨政權所造成的種種困擾，必須從「發展生產力」着手，乃着力於經濟調整。由這一基礎概念出發，六年來鄧小平政策路線着重於二個重點：第一、在經濟方面吸收自由經濟經驗，作某種程度調整，由農村推向城市，但不放棄「公有制」。第二、在政治方面，強化控制力量，以期沖淡因經濟調整所帶來的外在衝擊與內在歧見。這二個重點，由「四化」與「四個原則的堅持」口號作為體現。這二個重點，顯然並非平衡；而且社會內涵本屬繁複，「生產力」並不足以涵蓋整個社會。

壹、一九八五年政策重點

中共的年度政策取向，按慣例在「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中，會有若干顯示。雖然此項顯示與實際執行之間仍有距離，不過如剔除「社論」中那些空泛的政治口號，大致上仍可爬梳出一些跡象。

一、「四件大事」與「一個中心」

「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元旦獻詞「社論，由於同日刊登了鄧小平在「顧問委員會講話」，社論被下移至右下方。社論所述內容要點，可以在鄧的講話中找到依據，將兩者結合觀察，內涵更為清晰。

今（一九八五）年社論題為「和衷共濟搞四化」，這一標題代表了主層次概念，可以看出主要是求「四化」、求「團結」。將空泛文字剔除，顯露出次層次概念，也是具體重點：是「四件大事」、「一個中心」。社論所指的「四件大事」如下：

1. 推進以城市作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
2. 制定第七個五年計劃；
3. 繼續搞好整黨；
4. 進一步調整領導班子。

社論說明這四件大事圍繞着一個中心：「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目標則是在本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社論也呼籲

：這是一個「艱苦過程」，要「和衷共濟」，「凡是不和諧不協調的地方」，要團結起來①。

「四件大事」，分屬經濟、政治兩部門，本質上也就是鄧小平「經右政左」路線的延續。四件大事與社論標題相結合，前兩事是「搞四化」，屬經濟性，求「變」；後兩事是「和衷共濟」，是政治性，排斥差異，求「不變」。這裏出現了目標要求與當前所面臨的困擾：在目標方面希望塑造一個新的社會型態，包含經濟的「求變」與政治的「堅持」；但在另一方面「變」與「不變」也導致社會的矛盾與失調，成爲面臨的困擾。

二、意識層面的「時」「空」因素

馬列主義的基本困難之一，是「時」「空」規律的限制。誠如「人民日報」去年十二月七日評論所說，很多事情馬克思、列寧都沒有體驗過，他們的設想並非周到。因此，馬列主義之不能與現代急劇發展中社會相適應，乃屬當然，馬列主義並不能突破「時」「空」規律的限制。因此，越來越多的共黨政權，不得不調整政策路線，包括蘇聯、東歐集團與西歐共黨。

「調整」的共同原則，就是借重自由經濟經驗，引用「價值規律」、「價格體系」及「政企分離」等措施。經濟調整，在短期內都會有生產力轉變功能，但此種功能將是逐漸遞減。任何調整也都會帶來新的問題，中共的經濟調整，可以預見到另一面的後果，諸如：生產成本提高，刺激物價；生產設備有限，影響供需；孤立性着力經濟範疇內調整忽略其他，形成社會失調；尤其內部意見分歧，形成新的權力鬭爭，大致上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這些跡象。「人民日報」社論要求「和衷共濟」，要求改變「不和諧、不協調」情勢，都顯露內部分歧跡象。

三、局部性調整

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所涵蓋的各種因素，必呈現互動激盪、相互影響，然後構成整個社會變遷。無論經濟、政治、哲學、道德等，所處地位相等，功能各具。馬克思以經濟作爲社會基礎結構，以哲學、政治等爲上層組織，強調了經濟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單向」影響過程，這假設違背了社會的「整體變遷」與「互動」原則。共產主義者以馬克思主義爲最高指導原則，當然會帶來導向的嚴重後果。

現在共黨政權爲了解決實際困難，因而不得不作局部調整，以提升生產力爲其中心。但是由馬克思主義與列寧經驗所建立的共產社會，本身已自成體系，也構成另一型態的「社會整體」，假若共產制度不作整體調整，不作澈底改變，那對於局部性經濟調整的嘗試，自將成爲極大障礙。

註① 一九八五年元旦獻詞，「和衷共濟搞四化」，「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第一版。

「整黨」的目的，當然是在加強政治控制，以此與經濟體制改革並進。這種方式正如蘇聯、捷克和南斯拉夫等的改革計劃，都受到「政治權力」不放棄對經濟管理的「控制權力」所限制。政治制度如果不能配合，經濟調整功能當然受到限制。社會「整體變遷」說，在「理論」上提供證明；東歐、蘇聯經驗，也都已有了「實際」先例。

貳、整黨與政治權威

中共在「十二大」宣佈「整頓黨風」為黨內四項工作重點之一^②，一九八五年，中共將「繼續搞好整黨」列入四件大事之中。中共欲透過整黨，以重建其政治權威。

儘管中共致力於經濟開放，但中國大陸人民並沒有變得更自由，中共統治者也無意讓他們更自由。一九八四年十月城市經濟改革方案中，「加強黨的領導」仍然屬於重要事項^③。

一、中共政權的「權威危機」

一個社會如果不能有效的實行專業化分工，必將成為現代化的重要障礙。衆所周知的中共「政治掛帥」理論，形成了極度「泛政治」環境，社會其他領域受制於中共主觀政治權力，不能獲致充分發展專業機會，於是「瞎指揮」或「外行領導內行」現象普遍存在，社會發展形成萎縮。

此種「泛政治」型態，一方面固然使中共權力突出，控制了一切；但另一方面中共也必須擔負起政治成敗的全部責任。三十餘年建設進展滯緩，三信危機出現，這是人民自然地將政治責任歸之於中共政權。此種自然發展的結果，是中共政治權威的衰退。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危機，常在下列情況中出現：

1. 政府的基本結構與性質發生變動。
2. 權威基礎產生變動。
3. 所奉行的理念（意識形態）產生變動^④。

註② 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共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第一版，北平。

註③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月廿一日，第一版。

註④ 政治學者 Lucian W. Pye 等尤持此說，參見其所編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7-138.

以上三種情況，說明危機何以產生的具體根源。這些情況在中共三十餘年經驗中，均曾一一出現。「整黨」是否可以消除這些危機根源？這就是「整黨」能否重建政治權威的關鍵所在。

二、大規模整黨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從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以後，中共黨內的整肅工作，進入了具體執行階段。中共黨「十二屆二中全會」，於十一、十二兩天集會後，發佈「關於整黨之決定」^⑤，成爲具體執行的主要依據。

當中共「十二大」舉行時，鄧小平宣佈中共黨內四項工作重點之一即爲「整頓黨風」。當時胡耀邦聲明將要以三年時間從事整頓黨風工作，陳雲強調要在整頓黨風中將某些特定對象洗刷出去，所謂「三種人」之說，即由此而來。這些原則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大」時已經顯現出輪廓，經過一年醞釀，製造氣氛，以已有的原則作基礎，產生了「關於整黨之決定」。

這是一個長期性、普遍性的整肅工作，我們關切的重點之一，共黨何以要進行這樣一個行動？根據「決定」的說明，共黨黨內「腐化」、「不純」傾向，已到了「嚴重」程度。「決定」中承認：黨幹部和黨員對共黨政策有普遍嘲諷並缺乏信心。「決定」指出黨內普遍存在「不正之風」，如：

有些黨員對撥亂反正的意義缺乏認識，沒有站到馬克思主義路線的立場上來。

有些黨員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和優越性、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認識模糊，思想混亂。

有些黨員對違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視若無睹，有的甚至公然傳播這些思想。

有些黨員和黨員幹部個人主義嚴重，甚至惡性膨脹，爲謀求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不惜採取各種手段，走上犯罪的道路。

有些黨員和黨員幹部組織觀念淡薄，紀律鬆弛，精神不振，無所作爲。

有些黨組織軟弱渙散，甚至處於癱瘓狀態。

以上這些由中共黨中央文件所描述黨風問題，情況顯然已經嚴重，成爲「整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基礎。不過更可注視的，鄧小平爲建立鄧胡中心權力體系，爲報復「四人幫」，因而必須大力清洗異己，這應該是整黨的另一主要動因。

三、整黨的目標

中共整黨想要獲致的目標，有下列四方面：

(一)要求統一思想：「糾正一切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違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進一

註⑤ 「關於整黨之決定」，「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三日，第一版。

步實現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二)要求整頓作風：「糾正各種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行爲，反對對黨對人民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發揚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

(三)要求加強紀律：「反對無組織無紀律的家長制、派性、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改變黨組織軟弱渙散狀況。」，「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

(四)要求純潔組織：「把堅持反對黨、危害黨的分子清理出來，開除出黨。」

以上四項任務性質，可分屬於觀念層次、政治層次以及行政層次。以中共中央目前作爲看，能夠獲致成效的，以第四項較具可能性，第一至三項則困難皆大。這四項任務的結合，就是中共重建對內對外的政治權威。

四、展望整黨

在「決定」所描述的情況下，中共要透過整黨完成四項任務、重建政治權威，下列諸種發展是可注意的傾向：

第一、所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是以鄧小平路線爲基礎的政策顯示。「统一思想」的準則，是放在這一「路線」上，這就說明「整黨」的重要內在意義，思想一統是要求歸向鄧小平基準線。「左」、「右」的區分依據在此，「忠於黨」、「不忠於黨」的依據也是在此。

第二、糾正一切「違反四項基本原則」之說，早先一般觀察家常以爲此種「違反原則」心態，存在於共黨以外的中國人心底，以爲「四原則的堅持」乃是共黨與中國人之間利益的衝突與對立。現在可以發現、證實中共黨內對於「四項基本原則」也存有歧見。

第三、「糾正各種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行爲，反對對黨對人民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此種情況原本爲一般政治學者及行政學者所關切，防止之道，宜從制度監督着手。制衡觀念之出現，原在避免權力集中，避免權力濫用，「責任政治」由此乃有可能。

中共如不能建立具有制衡功能的制度，仍堅持「四原則」，使共黨繼續擁有突出的特殊地位，但却又企求避免「利用職權謀取私利」與「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其成功的可能性甚難發現。

第四、「民主集中制」要有制度，「民主集中制」原來解說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三十餘年來中共的作爲，有求於「集中」者過多，推展「民主」的誠意過少，造成了「家長制」、「派性」。如果沒有那麼強烈的「集中」意識，如果真有「民主」制度的存在，任何「家長制、派性、無政府主義」都可以避免。

第五、「把堅持反對黨、危害黨的分分子清理出來，開除出黨。」這一任務可能是最能實現的任務，也是這一次整肅的主要目的所在，中共清除這些人，「行」有餘力。

以上五項，究竟朝向積極面推進，或向消極面發展，皆將為整黨成敗所攸關。

叁、調整領導層的意義

一、秀異分子的社會功能

在一個社會中，秀異分子對於該一社會的影響是深鉅的。社會秀異分子雖屬少數，但他們的價值偏好、經驗信念、態度取向，常對社會多數產生導引功能。秀異份子的政治文化觀如果趨向於穩健，則可形成社會穩定力量；如果趨向於激進，尤其是尖端傾向突出時，便會導致極端不穩定，甚且使政治變遷趨於衰敗。祇有在不偏不倚情況下，社會穩定發展纔會出現。

政治領導層的產生與政治型態及制度運作，彼此間原本存在着互動的運作功能。在共黨政治體系中，此種傾向尤為突出。三十年來中共政權領導層並無太大變化，雖然內部權力鬭爭不絕，但大體上都有其共同性。此種共同性與馬克思理論有密切關聯。在馬克思構想中，「勞工階級革命，第一步就是將無產階級提升到統治階級」^⑥，進入專政。共產黨被解釋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以後，所謂「無產階級」，實際上已流於一個空泛的名辭。無產階級的具體化組織就是共產黨，取得黨的控制，就具有權力上先驅者地位，同時也是意識上的先知者，成為萬能。當意識與權力地位合而為一時，個人獨裁基礎，也就奠定。

二、「三個梯隊」說初現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各黨派協調會上提出「第三梯隊」的說法，他解釋：「黨內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幹部是第一梯隊……。第二梯隊是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第一線上工作的人。第三梯隊就是即將選拔進入各級領導班子的年富力強又有文化科學知識的幹部，這些人可以在五十五歲以下，甚至可以在四十歲左右」^⑦。胡的「第三梯隊」構想和當年毛澤東的兩線配備並不相同，因為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共的幹部陣營還沒有出現老化問題，祇有當權與被奪權之分，毛於一九五九年解除「共和國主席」，被稱為「退居第二線」，可作為說明。目前鄧小平集團的當權派陣營，則有衰老、老化和青壯三個階梯。

註⑥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第四卷，頁四六一，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九月，北平。

註⑦ 胡耀邦，「在各黨派共同協商會上致詞」，「大公報」，一九八三年六月二日，第一版，香港。

「第三梯隊」一辭雖然於一九八三年六月纔提出來，但實際工作則早已展開。幹部「四化」始於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二年三、五月間的黨政機構改革及九月「十二大」的中央權力機構改選，可稱具體體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胡耀邦訪日，聲稱將起用一千名中青幹部，擔任領導工作，一九八四年七月胡啓立等出任新職，「第三梯隊」建設工作轉趨積極。

三、兩大困難

中共中央組織部於今（一九八五）年二月十日向「新華社」記者透露，中共中央已經決定，在今年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九月召開之前，黨中央、「國家機關」部委及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領導班子全部調整，年底前把企業，特別是骨幹企業的領導班子調整^⑧。這一項人事調整幅度甚大，時間甚緊迫。

中共有許多嚴重問題有待克服，藉加速人事更替作為解決之道。最重要的問題有二方面：

第一、領導階層老化問題。目前中共領導階層年齡結構，最高領導核心六人政治局常委會，平均年齡七六·八三歲，其中最年輕的胡耀邦、趙紫陽二人，平均亦達六八歲；中央政治委員，平均年齡為七四·一歲；中央書記處成員，平均年齡六五·七歲；「人大」常委會正副委員長，平均年齡七六·一五歲；「國務院」國務委員以上人員，平均年齡六六·五歲；「國家軍委」正副主席、委員，平均年齡七七·八歲；年齡結構如此，在觀念、作風、政策取向等各方面都出現消極性傾向。

第二、黨內反對力量強化。以胡趙為主流的改革派，正遭遇黨內教條主義者強烈反對，一九八三年十月，以彭真、王震等為首，發動「清除精神污染」，使胡耀邦一派遭到重大打擊，周揚被迫作自我檢討，胡績偉被迫退休，王若水則遭貶斥。去年十月第十二屆三中全會，改革派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會上引起激烈爭執。會後，胡派發動一系列文字攻勢，攻擊教條主義者忽視實際、死抱馬列教條不放，甚至不惜宣稱馬列某些教條不合時宜作為攻擊。其後在「文代會」中，胡耀邦親自與會，並排斥鄧力羣參與。目前，此項爭執，雖由於鄧小平個人影響，以「和衷共濟搞四化」壓制下來，但暗流仍然洶湧。基於這些因素，中共當權派着力於加速人事更替，以期減輕老化和反對者的壓力。

四、阻力

人事更替工作，並非毫無阻力，最顯著的是老幹部不欲交權。今年「瞭望週刊」第八期專文，題為「三代默契，四化可期」^⑨，提出三個梯隊的任務：第一梯隊——長壽清靜；第二梯隊——扶持後進；第三梯隊——拼搏上陣。

註⑧ 「加快幹部「四化」步伐大膽起用一代新人」，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答「新華社」記者和本報記者問，「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一日，第一版。

註⑨ 「三代默契，四化可期」，「瞭望」，一九八五年第八期，二月二十五日，北平。

對一梯隊該文特別有段說明：「做爲老一代的第一梯隊，首先要自動脫離傳動，才能與其他兩個梯隊配合。所謂脫離傳動，就是不再干預政事。共產黨人也是血肉之軀，血肉之軀是一定要衰老的，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以衰老之軀干預政事，常會發生不應有的失誤，即使偉大人物也在所難免。因此，倒不如順其自然，去研究些養生之道，悠哉優哉，頤養天年，不亦樂乎？」這段話已經十分露骨，一方面要求交權，一方面則不欲交權。

肆、「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特性的顯現

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元旦社論所提出的四件大事一個重點，基本上是在鄧小平「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性格基礎上新的发展；四件大事一個中心也使「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特性，有更具體顯現。國際間中共問題觀察家，正密切注意鄧小平「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今後演變方向，這是中共政權一件大事，也是馬克思主義者一件大事。「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顯然並未定型，其內涵正在摸索；這一觀念之形成，也是由摸索中逐漸發展而來。任何一種觀念之產生，皆非突然一時之興，鄧小平的此一觀念，有其若干相關因素爲其動因：毛澤東的經驗、三十五年中共政權功能不彰等，皆屬其中之主要原因。

在馬克思的觀念中，共產主義社會之出現，乃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產物。但是在實際上方今所有共黨政權，皆屬偶然性的歷史因素所造成，無一是循馬克思原則，無一是因水到而渠成。在此種不自然的發展基礎上，新建立的共黨政權，常常需要回過頭來，以政權力量強制促使社會快速演變，削足適履地將之符合馬克思所規劃的「社會發展規律」。毛澤東所發動的「社會改造」，即屬此種方式。這是一個痛苦的不自然的過程，強力改變原有制度，強使社會改弦更張，並進而欲致力於新的文化型態建立。

一、觀念之連續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劉少奇提出在新黨章中列入「毛澤東思想」，說明其內涵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⑩。當時的主要作用較爲單純，一方面是爲了排斥陳紹禹（王明）等留俄派的依賴「馬列教條」自抬身價；一方面爲毛澤東的權力地位建立理論依據。着眼的重點，是在權力鬭爭關係。

鄧小平採擷了毛澤東這一方式，現在提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但是鄧小平的作法，目的已經複雜。一方面同樣是具有黨內權力鬭爭意義；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意義，那是深刻地體會了三十五年「馬列式社會主義

註⑩ 劉少奇，「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

」在中國強力推展並未成功，不得不另找途徑。

鄧小平與毛澤東的觀念，可能有關，但是兩者間存在着極大差別。

二、生產與需要的矛盾

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中共再一次「總結」了歷史經驗，這一方式也是毛澤東在第七次大會時期用過的方式，鄧小平也模仿了。這一總結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應走的「正確道路」十個要點^①。這十個要點大致勾勒出當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輪廓，其實也正是目前「中國式社會主義」「基本構架」。其中第一點尤其可以注意，第一點強調指出：「人民日益增漲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當前要解決的「主要矛盾」。這是一個非常可以注意的基本問題，也是共產政權甚為苦惱的問題。但牽聯廣泛，從思想層次、制度層次、政策層次到行政層次，都被牽涉。

中共提出的這第一個矛盾，至少包含了三點涵意：

第一，人類自然要追求一個更幸福社會，在物質上要求相當水準，精神上要求舒暢愉快，任何力量都不能改變這一自然需求。中國人同樣具有此種自然需求，共產政權也無此力量可以改變中國人此種自然本性。

第二，三十五年共產制度，對於社會生產方面的貢獻，是欠缺的，是落後的，並不能滿足人民需要，因此存在着「生產」與「需要」之間的差距，成為當前的「主要矛盾」。

第三，中共長時期低工資政策，其實就是企圖抑制中國人民自然需求，用作累積，現在發現這一政策將會造成嚴重後果。中共如果不能改變人民自然需求，則必須重視人民自然需求，否則中共政權的基礎將會動搖。

中共想要解決這一「主要矛盾」，而又不希望動搖共產主義本質。

三、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規律

社會是一個整體性構成，構成社會的各因素之間，具有平等的、對等的相互影響功能，難有主從、上下之分。如以為將「生產關係」予以調整，就可以「成功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會是一種簡單化的思考。胡耀邦曾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專文中提出如下看法：「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調整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的環節，調整那些不適應經濟基礎要求的上層建築的環節，就一定能夠成功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②。胡耀邦的思維，仍拘泥

註①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註② 胡耀邦，「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第一版。

於「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等教條，不過却也將之作同等排比，但是中共的作爲却顯示出各因素之間的失調情勢。

在經濟方面：以「經濟特區」和「合營經濟」，吸收外資和技術；以「個體經濟」和「城鎮勞動者集體經濟」，增加就業機會彌補共黨控制下就業僵化情勢；採取物質利益原則，以提高企業及職工經濟效益……這些在經濟領域的作法，是三十五年推展「馬、列式社會主義」體驗，促成了這些變革。這些作法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會發生相當衝擊。

在意識領域，隨着鄧小平奪權成功，逐步強化了政治控制：取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社會主義異化論」的論爭；「消除精神污染運動」；以及創設「國家安全部」、「人民武裝警察總隊」等。這些作法與趨向，可以強化專政，但並不是配合經濟調整的有利條件。

四、社會主義的扭曲

倘若果如馬克思主義者所稱：「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那麼「社會主義」的真諦應是以社會共同的力量，求取社會共同的幸福。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就必須建立在「社會共同參與」功能之上。「共同參與」是一個樞紐，由此可以結合個別智慧、提昇共同關切、認定共同利益，最終共享國家建設成果。否則，失去「共同參與」這一基礎，如竟或落入「專政」之中，則「社會主義」必然會出現一個扭曲面貌。

「中國式社會主義」，如只是在一些枝節的經濟作法上求調整，並未重視社會整體配合，這將出現一個不平衡的發展，也是一個失調的社會型態。這個「畸形兒」的基本成因，是由於中共政權過度重視一黨利益。這樣一個失調的不平衡，可能正是鄧小平所追求的藍圖；但如要使之成爲中國人樂於接受的健康社會，則必須消除「失調」，求取「整體的和諧」。

伍、「破字當頭」

一、四大矛盾

「紅旗」（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刊出一篇長文，顯示出中共政權面臨的一些基本困難，包含「理論與實際」之間、「破與立」之間、「局部和整體」之間、「領導和被領導」之間，都存在着矛盾。這些矛盾都可歸屬於內在實質層面，代表了當前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困擾。「紅旗」長文歸結了這些矛盾所形成的困擾，名之爲「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⑬，即是以上述四大矛盾爲探討主題。

註⑬ 《紅旗》雜誌編輯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紅旗》，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頁一，北平。

在上年十一月、十二月間，「人民日報」已將本文主要內容分別刊出，十二月七日的「理論與實際」即為其中之一部份。「紅旗」歸結了各專篇，也觀察了社會反應，總結成爲本文。

全文重點正如「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旨在求取團結，旨在求「立」防「破」，於是批判毛澤東「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原則，乃爲其主意所在。「紅旗」指此原則爲「毛澤東的一大失誤」，指這個命題，「作爲普遍性規律在自然科學上站不住，就是在社會科學的理論上也站不住。」

毛澤東的「破字當頭，立在其中」，這命題來自辯證唯物理論，先認定「矛盾」本質，再認定「否定」過程，於是演變出毛澤東的破立觀。從毛澤東一生效事來觀察，他的心理狀態以及處事處人原則，其實也自然暗合了這一破立命題。

二、歧見與權力鬭爭

中共內部的歧見，顯然是「紅旗」發表本文的主要動機。文內一段話已指出鄧政權的政策正受到內部嚴厲反對：

「如果讀了『哥達綱領批判』，就說現在中央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因爲馬克思不是這麼說的，那就大錯特錯了」。

中共內部強烈地反對鄧派現行政策，以「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層次進行反對。

路線之爭與權力之爭，在中共歷史中常糾合在一起，是否會再次形成中共內部的嚴重分裂？「紅旗」專文中作了強烈暗示。「紅旗」否定「破字當頭」原則，主要理由是現在已「沒有什麼強大反對派」，現在的總的政治任務是進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紅旗」以爲從今天的「實際」出發，「必須否定這種提法和做法」；否則，將會導致：「第一、可能重新動亂，第二、會嚴重地影響四化建設，第三、還會在全世界損害我們的形象」。用字已甚明確，涵蓋面也甚廣濶。

共產主義者在取得政權以後，常會遭遇到困難，主因在於「治天下」與「奪天下」的不一貫。共產主義者以唯物辯證法的運用，製造矛盾、擴大矛盾，用來奪取政權，毛澤東「破」字當頭，也就是共產黨人性格的流露。「奪天下」以破爲立的謀略，過度近視，種下了後果。

任何長治久安的「治道」，必須植基於衆意志的尊重、人民共同福祉的追求。「衆意志」與「共同福祉」亦即爲和諧與團結的內涵，是「治天下」所必需。此種社會型態與實質，當然與「破字當頭」相衝突，且形成嚴重對立。

胡耀邦等之必須反對毛澤東的破字當頭，是已經意識到唯物辯證法原則對「治天下」的不利影響。

三、鄧小平的憂慮

「人民日報」將鄧小平去年十月二十二日對「顧問委員會」的講話，在今年元旦第一版發表，且置於「社論」之上，顯示出

中共對於「講話」的處理是突出的。

在「講話」中透露出鄧小平目前顧慮到的幾個問題，下述三個問題正與現在政策取向有密切關聯^⑭：

第一、現行政策「連續性」問題，鄧小平體會到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他說：

「最近的時期，我總跟外賓談變不了，我們現行政策的連續性是可靠的，不過他們還不大相信。這個問題是個很大的問題，我是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不要宣揚我在這中間起的作用有什麼特別了不起，因為這樣的宣傳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說，鄧某人不在，政策要變，現在國際上就擔心這個問題嘛。」

這是被普遍注意的問題，但並沒有確切答案可資釋疑。

第二、中共內部對於經濟調整意見分歧，日益明朗化，鄧小平特別提到他對這一問題的顧慮：

「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鑽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

「解放思想，我們老同志有這個任務。」

第三、幹部老化問題，鄧以為這問題「疙瘩」比較多，要向老幹部提出讓位要求：

「『決定』（指「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共十條，最重要的是第九條。……第九條概括地說就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八個字，事情成敗的關鍵就是能不能發現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要說服老一點的同志把位子騰出來，要不然年輕幹部沒有位子呀。要說疙瘩比較多的，是在這個問題上。解決得不夠好的，也還是這個問題上。」^⑮

四、社會變遷的整體與互動特質

社會必然在不斷變遷之中，社會變遷又具有整體特性，因為人類總是不斷地在謀求生活內涵的提升，這一基本動力促使人類發揮智慧、解決問題，於是社會自然向前演進。

社會變遷過程中，構成社會的相關各因素之間，相互激盪，相互影響，形成社會互動。

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綜合組成，凡政治、經濟等等均皆涵蘊其中，涵蓋面廣泛。社會並非由單一因素所構成，也不是只有某一

註⑭ 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第一版。
註⑮ 同註⑭。

因素可以成爲基礎因素，或祇是單向影響其他因素，社會是既複雜又互動的人類生存環境。

方今鄧小平政權主要困難，是由於只希望取得經濟效果，而並不欲在政治體制上作合理調整。由於不能從根本上進行改革，於是社會變遷失却整體特性，於是社會互動產生困難。新年度的趨向、鄧小平的憂慮，仍然隱含了此種實質。

陸、經右政左矛盾與全民福祉

一、求取生產力提升

在現實意義上，鄧小平政權不得不調整政策，追求生產力的提升。三十多年實際體驗，共產主義社會制度萎縮了人民生產意願，必須借重自由經濟方式，以期解救現實的困窮。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評論員專論「局部與整體」稱：「把發展生產力放在第一位，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說明了鄧政權政策趨向；但是接着又說：這是「合乎馬克思主義，合乎中國實際的」，意味着「轉變」仍需具有意識上的「合法性」，於是又與馬克思主義套在一起^⑥。

共產黨人的本質普遍具有觀念封閉的屬性，不能容忍異己，動輒指爲「思想污染」，這些都是狹隘與封閉的產物，因此也就很難有創意，也不容許有突破性創意。胡耀邦等並未有太大例外，既承認「商品經濟的價值」，又仍然堅持生產資料公有，這是矛盾的。生產資料商品化，有其積極性意義，胡耀邦等當然不能有此種突破，他們仍然很難跳出意識的狹隘。

二、防止「污染」

在經濟政策轉變過程中，鄧政權理解到這必然會引起意識形態的衝擊。趙紫陽曾流露出焦慮，他強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防止和克服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在思想文化領域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⑦。

經濟政策上正在「吸收外來」經驗，在意識形態上却要「抗拒外來」理念，體現出一個矛盾的政策路線。當前中共政策的目的層次已經明顯，目的是希望「左右逢源」，經濟上借重資本主義旺盛生產能力，政治上建立有利共黨獨占優勢，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無非即此之謂。但是「資本主義」生產能力，是有其他社會條件相配合：政治民主、自由意識、開放社會、教育提

註⑥ 本報評論員，「局部與整體」，「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第一版，並參見附註⑤。

註⑦ 趙紫陽，「（六屆二次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六日，第一版。

升等，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配合，就出現不了資本主義在生產方面的優越性。

經濟建設的成就，並非可以單獨出現，也不是孤立存在，經濟建設必然與政治制度相互依附。當政治功能達到可以促使個別智慧有充分發展機會時，經濟成就乃得隨之而來；經濟建設成就也會促使社會趨於更開放，互為動力，互為成果。

趙紫陽曾明白地表示：「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抵制精神污染，對於提高人民羣衆的思想覺悟具有積極作用」，是一項「長期的根本的任務」^⑭，這樣就可以瞭解中共所面對的意識衝突，是明顯存在，且是長期的對抗。

三、「理論與實際」的困擾

共黨政權以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發展的指導原則，包含秀異份子職業革命家的特權、恐怖公安警察、獨佔傳播系統，以及經濟的集權控制。在共黨政權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意識形態的堅持就產生了導向作用，政治發展的方向、目標，必也在意識形態的解釋基礎上進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以後，鄧小平掌握政治權力，從事政策調整，隨即出現共產主義意識解釋上差距，因而產生困難。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刊出「理論與實際」評論員文章所引起的風波，其本質即在政策與意識的差距。

評論的重點，着眼於「時空因素」在社會變遷中的影響作用，一百年前馬克思的觀念，對於已歷經百餘年變遷的今天亞洲社會，不能再賴以作為解決問題的依據。評論作了如下分析：

「馬克思逝世已經一百〇一年了，他的著作是一百多年前寫的。有的是當時的設想，後來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有的設想不一定妥當。很多事情，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過，列寧也沒有經歷過，他們沒有接觸到。

「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⑮

這一段說明，似屬平實，但在普遍情緒化的極端主觀的共產天地中，當然是「石破天驚」之舉，因此引起了各方面廣泛報導與評論。這一段言論是依據胡耀邦在內部會議講話，意欲作更廣泛政治傳播。刊出後，中共發現惹來了麻煩，於是謀求補救之道。八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出了「補正」，放在右下角最不顯眼的位置，對於七日的評論文增加了「所有」兩字。中共中央發言人復於十一日向新聞界說明，「馬克思主義基本上不能與中共分離」，此項說明意在對七日「人民日報」評論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再作正面澄清。「補正」旨在降低語氣，將以前的聲明作了有條件的限制。中共發言人則正面說明中共與馬克思主義「基本上不能分離，立場已經表明。二十一日，「人民日報」再又刊出「再談理論與實際」評論文，重覆了這一立場。

一種思想一種理論，必然與社會背景有密切關聯。社會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促使思想的產生，「思想」者在本質上亦即為解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本報評論員，「理論與實際」，「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第一版；並參見註⑬。

決問題的方案。由於特定時間特定空間所存在的問題，成爲促使思想產生的基本依據，因此，「思想」又無可避免地有其時空限制。馬克思主義是一百年前（時間）歐洲社會（空間）的產物，這是本然的實質特性，乃屬無可置疑。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缺乏理解，自己有此提述，也是理所當然。但長時期來，共產主義者却以馬克思主義爲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欲以之應用於任何時間任何社會，欲以此用作解決任何問題的原則，其必將遭遇意識的困窮，迨屬無可避免。

四、歸向全民民權社會

中國人傳統理念中原已擁有崇高的「民本」思想，且歷史久遠。「孟子」一書稱：「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久爲中國知識份子所信奉，且在啓蒙教育時期即爲教材內涵。以此原則爲基礎，引申出以民爲本的思想體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說明國家乃爲「全民所有」，非任何少數人所得私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說明政策取向之唯一依據在民之好惡。「保民置產」原則，說明福利國家中國家建設應落實在提升人民生活內涵。建設成果，則應爲「全民共享」^②。

中國歷史的遺憾，是欠缺健全的全民民權制度，在中國悠久歷史過程中，中國人的智慧並未將民本「思想」轉化爲具體的民權「制度」。因此，傳統思想意境甚高，但是欠缺具體制度的配合，以致「思想」仍祇停留在思維階段，未能形成爲「全民共治」的國家。民本思想涵蓋了「民有」觀念與「民享」理想，需要「民治」制度爲之支持，然後可以落實。「民權」制度的欠缺，成爲中國人的歷史性遺憾，這就是中國人的努力方向^③。

「階級專政」祇能造成專政與被專政者間的矛盾；「四個原則的堅持」祇能說明共黨利益與中國人利益的對立；「經右政左」的取向祇能擴大社會的失調。鄧小平的政策取向，仍未在解決中國人全民長遠的共同需求上着眼。

從根本上探討中國人共同問題，從長遠處思索中國問題解決之道，必須在民本思想與全民民權制度這一方向有所體認、有所着力。這樣將可發現：調和「經右政左」之道在此，求取「和衷共濟」之道在此，從根解決十億中國人共同問題之道，尤其在此。

註② 「孟子」，全書七篇，爲中國儒家思想經典著作之一，全書以民本觀念爲重要基礎，約著於公元前三世紀初期。

註③ 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先生創「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基本觀點與美國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之說相合，但更具體而且詳盡。其中民權主義所提主張，即是全民民權制度構想。